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故都济困：

北平社会救助研究（1928~1937）

Relief in Peiping:
The Study on Social Assistance
in Peiping (1928-1937)

刘荣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主办

梁景和 主编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故都济困： 北平社会救助研究（1928~1937）

Relief in Peiping:
The Study on Social Assistance
in Peiping (1928-1937)

刘荣臻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都济困：北平社会救助研究：1928－1937 / 刘荣臻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1(2017.1重印)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ISBN 978 - 7 - 5097 - 9769 - 3

I. ①故… II. ①刘… III. ①社会救济 - 研究 - 中国
- 1928 - 1937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229 号

·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 ·

故都济困

——北平社会救助研究(1928~1937)

主 编 / 梁景和
著 者 / 刘荣臻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编辑 / 吴 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54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769 - 3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编 委 会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刘志琴 郑师渠 耿云志 戴逸

学术委员会主任

梁景和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雪峰 左玉河 吕文浩 朱汉国 孙燕京 杨才林
杨念群 李长莉 闵 杰 余华林 迟云飞 夏明方
徐永志 郭双林 黄 东 黄兴涛 魏光奇

主 编

梁景和

总序

梁景和

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发生了重大变革，学术界迎来崭新的繁荣时期。中国近现代史与其他史学专业也都有了长足发展。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犹如本专业的其他领域，亦展现着自己特有的新生魅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史的复兴，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的复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兴起，这三条线索所铸成的链环与其他领域紧密结合，呈现中国近现代史的强劲发展势头。其中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走过二十多年的艰辛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学者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问题。^①1990年有学者撰文^②提出“社会文化史”的学科概念。1991年有学者在学术领域开始运用“社会文化史”^③的概念。1992年与2001年，在北京先后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两次学术研讨会，^④该两次会议集中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问题。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在青岛、乌鲁木齐、贵阳、苏州和

① 刘志琴（署名史薇）：《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②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③ 梁景和：《辛亥革命80周年全国青年学术研讨会关于社会文化史问题的讨论述评》，《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梁景和于1994年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提要中说明本论文的“社会文化史”的属性，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参见《〈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提要》，1994年5月未刊稿。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襄阳召开了5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化史论文发表，^①也有关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文章。^②2009年6月和10月，2010年4月在北京先后召开了3次“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③这也是开始以社会文化命名的学术会议。

2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征。

首先，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中国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中国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的研究。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萌发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主要研究者是顺着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的。

其次，理论探索的自觉。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在1992年“社会文化史研讨会”和2002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讨论，并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理论见解。^④此外，刘志琴的《青史有待垦天荒——试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⑤梁景和的《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⑥和《社会生活：社会文化

① 参见吕文浩《“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朱浒《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1期；毕苑《第三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黄鸿山、朱从兵《“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第四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② 梁景和：《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③ 参见王红旗主编《中国女性文化》第1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2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④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 参见《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⑥ 参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① 李长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② 等都属于中国社会文化史探索的理论文章。

最后，展现出重要的研究成果。2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③ 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余华林的《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等，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④

中国社会文化史发展至今，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相关历史资料数量庞大，但非常分散、芜杂、缺乏整理。相当多的研究者尚缺乏运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自觉性和经验积累，缺乏研究范式上的建树。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研究

① 参见《河北学刊》2009年第3期。

② 参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

③ 关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论文请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左玉河、李文平《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评述》，《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苏全有等《近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风俗史研究综述》，《安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黄延敏《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近代中国与文物》2009年第2期等文的介绍。

④ 重要的社会文化史学术著作还很多，诸如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方平的《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德〕罗梅君的《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王燕生等译，中华书局，2001）；薛君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此不赘述。

者缺乏必要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训练等。^① 这些都是具体的实际问题，需要学者一点一滴地处理和一步一步地解决。

中国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盼望早日迎来中国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新时期。2010年5月出版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② 同期召开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③ 以及《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刊发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一文，既是对以往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史未来发展的一个期待。2010年9月25日、2012年9月22日和2014年9月20日在北京分别召开了“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11年9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2013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会议来推动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我们坚信，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会迎来崭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之初就引起了诸多年轻学者的兴趣，如今则吸引着众多青年学者把中国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的学术向往和追求。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编辑出版“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主要目的就是要把热衷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论著发表出来，希望本论丛的陆续出版能促进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2014年12月20日修改于幽乔书屋

^① 参见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③ 毕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综述》，参见梁景和主编《社会生活探索》第2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何以救助：北平社会救助实践的时代环境	16
第一节 频繁的战争及严重的自然灾害	16
第二节 北平的社会问题	23
第三节 北平救助的文化基石及西方救助理念的借鉴	34
小 结	50
第二章 先期实践：清末民初北京社会救助事业	51
第一节 北京社会救助事业的运行机制	51
第二节 社会救助法规	60
第三节 北京社会救助实践活动：以娼妓、婴幼儿为检视对象	68
小 结	80
第三章 制度规制：北平社会救助的制度化建设	82
第一节 北平社会救助行政体制及实施机构的制度化	82
第二节 社会救助的法制化建设	92
小 结	106
第四章 政府济困：北平官方社会救助活动	108
第一节 北平官方的社会救助	108
第二节 北平官方救助的具体实践：以妇女、乞丐为对象的考察	144

小 结	163
第五章 民间施救：北平慈善组织的社会救助活动	164
第一节 北平慈善组织发展概况	164
第二节 北平慈善组织的救助活动	172
小 结	183
结 语	185
参考文献	204
附录：各章节图表	216
后记（一）	221
后记（二）	223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

1. 基于对迁都后北平^①民众生活的关注

1928年6月，国都南迁，受其影响，昔日北京所享有的特权、盛誉与繁华遭到了严重冲击。美国作者董玥（Madeleine Yue Dong）在其《民国北京：城市及其历史》一书中曾指出：

在北京史上，192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在某些方面它的影响可以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所产生的冲击相比较。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央政府随即迁移南京，使得北京这个城市受到了严重挑战。几个世纪以来曾一直独占首都地位的北京，已经习惯了享有一切由王朝国都地位所赋予的特权。……

首都意外地迁移到南方，各部委被取消，北京整个城市变得荒凉起来。此外，富裕家庭离开北平又导致了这个城市财富的减少。北平的财政陷入了危机，对这个城市来说想要维持以前的状况实在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②

迁都引发了北平商业萧条、工人失业。据统计，1928年7月至1929年6

① 北京在1928年6月国都南迁后被改称为北平，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书以迁都后至抗战前为研究范围，在行文中如所述事件发生在国都时期，则称为北京；如所述事件发生在国都南迁后，则称为北平，1928年6月至1930年6月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6月至12月为北平市（属河北省辖），1930年12月至1949年9月为北平市（属行政院辖），为行文方便统称北平市。因北平的行政名称变化，其下属社会局的名称也随之变化，本书中如无特定情况，统称“北平市社会局”或“社会局”；该局下属救济机构名称则统一用简称，如“北平特别市救济院”称“北平市救济院”或“救济院”。

②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78.

月，在北平 52 个工会 91476 名职工中，有 32.7% 的职工处于失业状态^①。此外，北平仅因军政各部署的裁撤而直接间接赋闲的人员竟高达 10 万余人^②。迁都后的北平，“其命运仿佛夫媳遽亡，家道中落而无以为恃”^③，昔日生活于天子脚下、受惠于帝都恩惠的北平民众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剧烈分化，广大市民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逐渐沦为乞丐、贫民、无业游民等弱势群体。这些曾经承蒙国都地位恩典的北平民众，在丧失国都地位所赋予的保护伞后，他们的生计又如何？北平市政府又给予了他们何种救助？这种救助呈现出何种面相，其效能如何？

2. 基于对现实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怀

在探求历史与现实的学理关系时，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曾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意味着“历史的本质在于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根据当前的问题看待过去”^④，当然，历史学者研究的过去“‘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⑤。因此，由现实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实，就成为史学研究者不容回避的责任。

1978 年，是值得亿万中国人铭记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向世界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21 世纪的今天，当回观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时，我们会发现，改革既成就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非凡业绩，但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中较为凸显的是城市弱势群体的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弱势群体主体构成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据调查资料和综合分析，目前城市弱势群体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1）传统意义上的“三无人员”，即持有城市非农业户籍的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义务人的公民。（2）城市贫困职工，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企业不景气的在职职工以及退休职工。（3）城市外来人口中无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者。^⑥ 这些城市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是因贫困而沦为弱势的，虽然我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图 0-1），对城市贫困居民实行低保制度，但

①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p. 80.

② 《北平最近之萧条情形》，《北平日报》1928 年 8 月 7 日，第 6 版。

③ 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台湾学生书局，2008，第 9 页。

④ 转引自〔英〕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 104 页。

⑤ 〔英〕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第 105 页。

⑥ 关爱萍：《城镇贫困与缓贫对策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003 年第 1 期。

由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而政府现有的救助力度有限，所采取的保障措施也就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2015年4季度，全国县及以上城市贫困低保人数为1708万余人（960.2万余户），人均月支出为303.32元/人。^① 总体来看，我国城市贫困居民人均生活保障标准过低，根本无法改变城市弱势群体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强弱两极对立的格局将成为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极不和谐的因素。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② 现实促使我们反思，历史上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如何？政府是怎样解决城市弱势群体问题的？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对我们现在有何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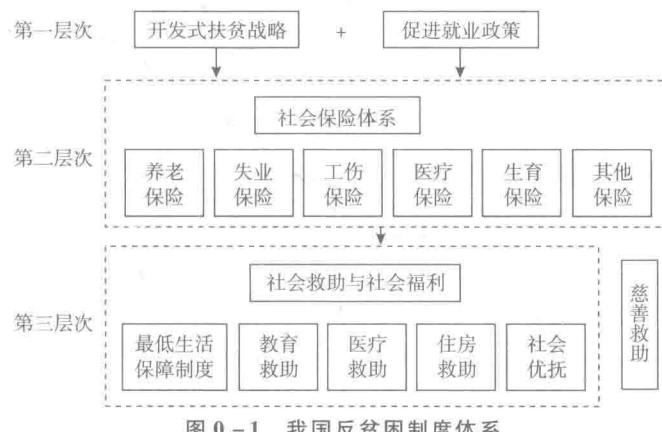


图 0-1 我国反贫困制度体系

资料来源：参见曹艳春《我国城乡社会救助系统建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80页。

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引发了笔者对国都南迁后北平弱势群体及救助的研究兴趣，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当今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贡献些许启发和借鉴，同时，也希望这一研究对进一步完善北京史的研究及深化对北京史的认识提供些思路和资料。

^① 参见“服务→网上查询→统计数据→统计季报→2015年4季度全国县以上城市低保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b/dbsj/201602/2016020088030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2月20日。

^② 王思斌：《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3期。

二 概念的厘定与诠释

1. 北平市区域的界定

北京自辽代定都以来，历经金、元、明（图0-2）几代的发展，到清时都城面积得到了较大扩展。明朝定都北京后废除了元代的城市巡警院建置，设立了内外五城，内城分东、西、北、中四城，外城即为南城。清代北京城基本延续了明代的城市格局，只是在内外城的划分上有所不同。^① 清代实行了内八旗，外五城制，即内城由八旗划地驻防，外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至清末，成立警察厅，前制悉废”^②。随后，警察厅所辖的内外城又分别划分为10个区。北洋政府时期沿袭了这一制度。1928年6月28日，国都南迁后成立的北平特别市对市辖区域又做了调整，1928~1937年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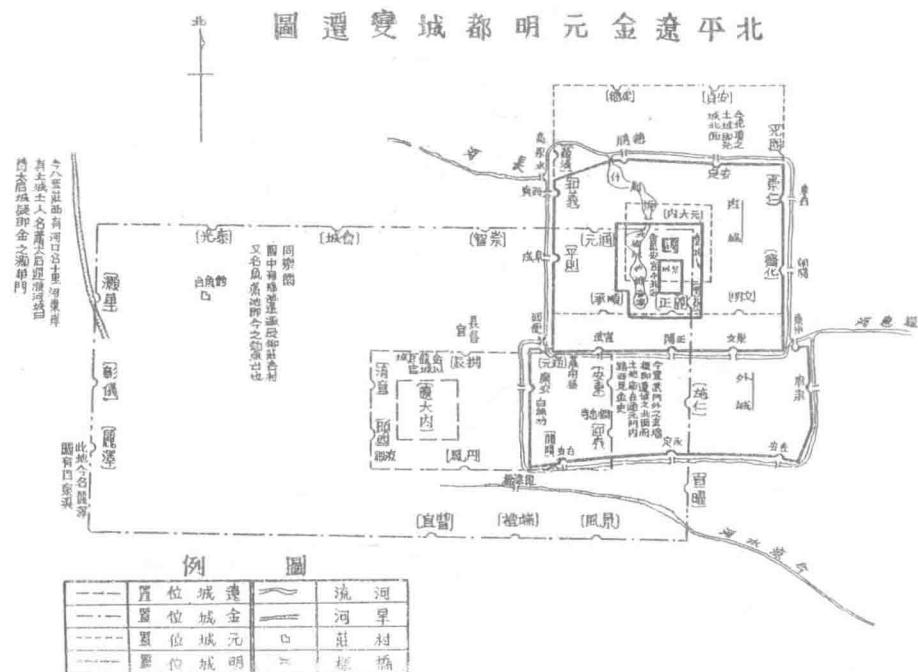


图0-2 北平辽金元明都城变迁

资料来源：《北平市之沿革》，《北京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

①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40~42页。

② 尹钧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北京出版社，1994，第176页。

平市所辖区域为北平内城、外城以及附近郊区。内外城分别划分为 6 个区和 5 个区，即内一区至内六区，外一区至外五区；附近郊区划分为 4 个区，即东郊区、西郊区、南郊区和北郊区。其范围东至东坝，西至香山，北至清河，南至北大红门，面积为 700 多平方公里。^① 本文涉及的北平界域仅限于 1928 年至 1937 年北平市所辖区域，即北平内城、外城以及附近郊区。

2. 弱势群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与发展，尤其是社会学学者对社会问题研究的深入、社会工作的开展以及社会福利思想的普及，“弱势群体”概念逐渐盛行。

“弱势群体”全称为“社会弱势群体”，英文称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国内也称之为“社会弱者群体”或“社会脆弱群体”。何为弱势群体？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仍是众说纷纭。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分别予以解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生活贫困说。这种观点认为靠自身力量难以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达到一般社会生活标准，从而使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其代表性观点见于郑杭生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书中对社会脆弱群体的解释，他指出：“社会脆弱群体是指凭借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②

(2) 资源分配不公说。这种观点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导致了某些社会群体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较低地位，他们与主流人群不能平起平坐。其代表观点见于王思斌《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一文。在此文中，弱势群体被解释为：“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③

(3) 多维表征说。这种观点认为弱势群体不仅在经济利益、社会资源的获得上表现弱势，而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弱势，是一个具有多种综合特征的社会弱者。其代表性观点为朱力所持，他在《脆弱群体与社会支持》一文中指出：“脆弱者群体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还具有一些综合特征。(1) 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左右，处于社会底

^① 尹钩科：《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第 178 页。

^② 郑杭生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 32 页。

^③ 王思斌：《社会转型中的弱势群体》，《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 年第 3 期。

层。（2）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入不敷出。（3）生活质量较低，用廉价商品，穿破旧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并有失学等后果。（4）除经济生活压力大以外，心理压力也比一般人大，没有职业安全感，经济收入不稳定或过低，常有衣食之忧，对前途悲观。（5）由于能力、素质较差，或生理高峰期已过，缺乏一技之长等自身制约因素，能改变目前状况的机遇也较少，致富较为困难。（6）这种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将持续一段时间甚至永久。”^①

以上观点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做了说明与界定，基本揭示了弱势群体的本质特征，而这些观点主要聚焦于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笔者认为“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应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这一概念所折射出弱者“弱”的程度、表现以及所含纳的主体是不相同的。“弱势群体”的概念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由于生理、社会因素导致某些社会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排斥，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狭义是指由于生理、社会等因素致使某些社会群体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维持一般社会生活标准的生活有困难者群体。本书所指的“弱势群体”是就狭义层面而言的，主要包括贫民、灾民、乞丐、失业者、老弱残疾者等。

3. 社会救助与社会救济

社会救助与社会救济具有一定的相承关系，社会救济是社会救助发展的初始阶段，而社会救助则是社会救济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救助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强调施助是政府的责任，受助是公民应有的权利。郑功成认为，“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面向由贫困人口与不幸者组成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款物接济和扶助的一种生活保障政策，它通常被视为政府的当然责任或义务，采取的也是非供款制和无偿救助的方式，目标是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②而社会救济是一种消极性、施惠型的济贫救困措施，是以牺牲受助者尊严为代价的施舍。

受西方先进救助理念及救助方法的影响，民国以来，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事业已具有了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特征，法制化、制度化建设逐渐成为其发展主流。回观以往研究，绝大多数学者使用“社会救济”一词，但

① 朱力：《脆弱群体与社会支持》，《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②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2000，第13～14页。

笔者认为，社会救助更合适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实态。因为当时社会救助的水平较低，且救助仍具有传统社会救济的某些特征，但这时的救助理念已从“政府施惠型”向“政府责任型”转变，救助方式更多体现的是对受助人自立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对受助人单一的物质接济。笔者在行文中使用“社会救助”，但在引用相关论著时仍使用原作者的“社会救济”一词。

三 相关研究成果回望

长期以来，弱势群体及其救助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视角书写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并提出一些有助于解决弱势群体生存困难的对策与措施，兹将相关研究成果分期论述。

1. 1949 年前的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纵深发展，社会生活，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生活逐渐成为前辈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救荒史》详细论述了从远古到民国不同时期的灾荒概况、灾荒成因、历代救灾思想及灾后的救助措施等，对中国数千年的灾荒史做了总结概括。^①《社会救济》一书，对中国以往社会救济进行了总体回顾，并对当时中国社会救济的现状及未来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书中特别强调对老人、乞丐、儿童、难民等弱势群体的救济。^②《中国贫穷问题》对民国时期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及贫困人口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如何防治贫困人口提出了应对措施。^③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总结与回顾了中国历代灾情及其救济对策，并从慈善组织、防疫工作、仓储制度、水利工程、垦殖计划 5 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民国以来的社会救济事业，同时对民国时期中央赈济机构的演变、赈济政策的确立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近十年的赈济工作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④《社会问题大纲》探讨了社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现状以及社会问题发生的原因等，并着重对妇女、失业者、农民等弱势群体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做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1993 年再版。

^② 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4。

^③ 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47。

^④ 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